

典範的選擇 ——以民國學者評論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為例

黃忠慎^{*}

摘要

清代的姚際恆、崔述與方玉潤在《詩經》學史擁有極高的身價，論者通常以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稱之。不過，在他們有生之年，其說《詩》著述不僅並非經典之作，甚至也稱不上是名著。本文以姚際恆等三人為例，討論《詩經》學史的撰寫與評斷過程中的意義賦予問題。

就《詩經》學史來觀察，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評價之所以直線上升，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典範鑄造，他們的著作長期默默無聞，整體學術表現更不能說是卓越超倫，然而當時代思潮一起，學術史的撰寫者因其部分說法或解釋與新思潮有若干相符之處，因此力加標舉，引以為先驅，並且大加讚譽。這兩種典範成形的狀況，主要還是跟學術史撰寫者的時代背景或自身的喜好有關。

哲學詮釋學表達「成見」的正向意涵及其存在的不可去除性。「成見」必須「理解」，「前理解」必須被深刻地剖析。面對學術史的撰寫或是對某位前輩學者的研究，「成見」將會影響書寫，這點不必也不能苛責。問題是閱讀者必須更小心地理解這些具有「成見」的書寫，這樣獲取的認識或許將更加真實。

關鍵詞：典範 姚際恆 崔述 方玉潤 《古史辨》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美國的湯瑪斯·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在 1962 年出版了極具影響力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對科學發展的常態模式的新解釋。¹ 過去認為科學是以普遍有效之實驗方法與結果為基礎，逐步累積知識的形成，並完善系統。孔恩對此種觀點表示質疑，他主張進展往往是經由影響深遠的「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s）而達成的。「典範」（paradigm）一詞是孔恩說明科學發展的重要創見，雖然他對於這個詞語所下的界義尚不夠明確，但至少提出了典範所具備的特徵或條件：作者的成就實屬空前，且其著作中留有許多問題能讓有志一同的後起者來共同解決。² 孔恩所提「典範」的條件與內涵容或具有一些模糊性，但國內學者使用孔恩「典範」一詞的概念時，大致上都肯定「典範」是一種新方法與領域的建立，³ 對於後來的學者具有示範以及成為論述中心的作用。

¹ 按：2002 年，大陸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擬譯介當代世界哲學學術名著，委請陳波與英國的蘇珊·哈克（Susan Haack）教授聯名邀請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芬蘭、巴西六國的 16 位哲學家參加「當代世界名著·哲學系列」的編委會，回應邀請的共有 5 國（缺澳大利亞）11 位，連同蘇珊·哈克則是 12 位。這些編委都是當今世界一流甚至是頂尖的哲學家，他們的推薦單被整理出「得票最多的一組」與「得票次多的一組」，「得票最多的一組」中，孔恩（該書譯為托馬斯·庫恩）獲得的總票數是 5 張，全部集中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在兩組合計 31 名被推薦者中高居第 9 名，領先了一些名聲極為響亮的哲學家，如第 12 名的福柯（Michel Foucault）、第 24 名的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第 25 名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第 26 名的利科（Paul Ricoeur）等，蘇珊·哈克本人也在被推薦名單中，獲得提名票 2 張，集中在《證據與探究——走向認識論的重構》（*Evidence and Inquiry: Towards Reconstruction in Epistemology*, 1993）一書。詳蘇珊·哈克（Susan Haack）著，陳波、張力鋒、劉葉濤譯：《證據與探究——走向認識論的重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卷前，陳波：〈總序二〉。這個數據可以證明孔恩之《科學革命的結構》是被當代哲學界高度肯定的著作。

² 孔恩對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的解釋是「意指以過去的科學成就為基礎所從事的研究，這些科學成就是某一科學社群的成員在某一段時期內所公認的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他指出「在今天，重述這些成就的任務，是由教科書來承擔的，但極少以其原始的形式呈現給讀者。這些教科書闡述業已被科學社群接受的理論，列舉出種種成功的應用例證，再將它們與當初建構這些理論所依據的觀察與實驗範例作比較。在十九世紀之初，這類教科書被廣泛使用前，許多著名的科學經典亦有相類似的功能，諸如亞里斯多德所寫的《物理學》（*Physica*）、托勒密的《天文學》（*Almagest*）、牛頓的《原理》（*Principia*）及《光學》（*Opticks*），富蘭克林的《電學》（*Electricity*），拉瓦錫的《化學》（*Chemistry*），及萊爾的《地質學》（*Geology*）。這些及許多其他的著作出版後，成為某一時期的學者公認的聖經，因為它們隱約為其研究領域界定了合理的問題，及解決的辦法，使後世的人得以遵循。這些著作獲致這種地位，源自它們共有的兩個特徵。第一，作者的成就實屬空前，因此能從此種科學活動中的敵對學派中吸引一群忠誠的歸附者。第二，著作中仍留有許多問題能讓這一群研究者來解決。具有這兩個特徵的科學成就，我以後就稱之為『典範』（paradigms）。」孔恩：〈常態科學如何產生〉，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革命科學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 年），頁 53-54。

³ 林正弘：「孔恩對典範一詞未給予明確的定義，但大致包含下面幾個項目。（a）明確寫出的定律或理論。……（b）適用基本定律的標準方法。……（c）工具與使用工具的規則也包含在典範之內。……（d）指導工作的形上學原則。……（e）方法論規則。」〈卡爾波柏與當代科學哲學的蛻變〉，《伽利略·波柏·科學說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年），頁 67-113。

4

在中文的使用上，「典範」義近表率、楷模，但是以這樣的語意所形成的概念來檢視、評斷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名著，勢必很難凝聚共識，而且，可預料的是，將出現滿坑滿谷的典範。⁴所以本文借用孔恩所闡述的「典範」概念來進行論述，這樣可以將可能引起的爭議減到最少。

就《詩經》學的發展歷史來考察，毛公、鄭玄與朱子，可謂《詩經》學史上的「典範」，這應該是無庸置疑的，甚至，從影響論的角度來看，作者與完成時代都無法確認的《詩序》也是。這些學者或著作在當時乃至於後世都持續地獲致普遍性的讚譽，並且對於後來的讀者、研究者具有深遠的引導作用。然而，觀察研究者對於《詩經》學史的論述，我們發現有某些備受推崇的學者，其名聲與著作之價值在當時並未彰顯，直至後來卻漸漸或陡然為人所推重。湮沒不彰的著作在後世被發掘，有時候當然是後人的慧眼獨具，只是，觀察這些學者與著作所架構的理論、方法與迸發的影響力，卻也可發現部分學者之所以能獲致崇隆之名聲另有他故。本文即以、姚際恆（1647-1715）、崔述（1740-1816）、方玉潤（1811-1883）為例，討論《詩經》學史的撰寫與評斷過程中的意義賦予問題。

二、姚際恆等人的《詩經》學

（一）姚際恆的《詩經》學著作

姚際恆以《詩經通論》之作在《詩經》學史上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姚氏治學注重辨偽，他曾在《古今偽書考》表示「辨」是讀書的第一義。⁵在《詩經》研究方面，他將辨偽的矛頭指向流傳二千多年的《詩序》。姚氏反對《詩序》的主要理由是它的來源有問題。他用辨偽的角度分析《詩序》的來歷之真假，以為是東漢衛宏所作，而不是傳說的子夏所作。而衛宏從學於謝曼卿，因此他說：「《序》之首一語，為衛宏講師傳授，即謝曼卿之屬。而其

⁴ 余英時：「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典範』這個中心觀念有極詳細而複雜的討論。但簡單地說，『典範』可以有廣狹兩義：廣義的典範指一門科學研究中的全套信仰、價值和技術(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s, and techniques)，因此又可稱為『學科的型範』(disciplinary matrix)。狹義的『典範』則指一門科學在常態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exe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科學史上樹立『典範』的巨人一般地說必須具備兩種特徵：第一、他不但在具體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並且這種成就還起著示範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著他的足跡前進。第二、他在本門學術中的成就雖大，但並沒有解決其中的一切問題。恰恰相反，他一方面開啟了無窮的法門；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無數的新問題，讓後人的人可以繼續研究下去，因而形成一個新的科學傳統。」〈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頁383-385。

⁵ 猶如「大師」一詞，若無意義上的共識，同時代的兩位大師之間的學術造詣恐將有天壤之別。以清代為例，樸學名家固然輩出，又豈能如支偉成所列，大師多達三百七十餘人？支偉成所列，詳《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目次〉，頁1-13。

⁶ 姚際恆：「造偽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偽書滋多於是。學者於此，真偽莫辨，而尚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古今偽書考》（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7年），頁1。

下則宏所自爲也。」他把《詩序》第一句稱爲〈小序〉，是謝曼卿傳授的；第二句以下稱爲〈大序〉，是衛宏自己作的。不管是〈大序〉還是〈小序〉，都是東漢人所作。⁷ 既然《詩序》爲東漢人作品，非出於聖人之傳，其說不必信也不可信。在《詩經通論·序》裡，姚氏舉出《詩序》的幾個缺失。他對《序》之首句所使用的評語是：固滯、膠結、寬泛、填湊，諸弊叢集，第二句以下則「尤極踳駁」。⁸ 對《詩序》之說解三百篇，姚際恆常用的批評詞彙包括迂曲、附會、迂而無理、臆測、迂折、寬泛、執泥、鶻突、泛甚、無句、揣摩、混謬、泛混、杜撰、稚、幼稚可笑等等。這些充滿負面意涵的詞彙、甚至嘲弄性的、情緒性的字眼，反映出姚氏對《詩序》的基本看法。

這裡要特別指出姚際恆反對的是《詩序》的歷史性，藉此反對《詩序》對詩旨的解釋。但是《詩序》解釋立場中的聖人教化與捍衛傳統倫理價值的觀點，卻是姚際恆所堅持，並且引爲說解重點的。⁹ 亦即姚際恆雖然反對《詩序》，但是他反對的大多是《詩序》對於詩意的細部解釋，實際上在意識型態與價值判斷方面，他和《詩序》的說解立場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姚際恆曾對晚出的經解有強烈的批評：「嘗謂經之有解，經之不幸也。曷爲乎不幸？以人皆知有經解，而不知有經也。曷咎乎經解？以其解致誤，而經因以晦，經晦而經因以亡也。」¹⁰ 又說：「故諸經之亡，皆亡于傳注。」¹¹ 傳、注本爲解釋經文的輔助性工具，在姚際恆的心目中，卻反過來成了探尋聖人之意的障礙，因此他亟欲排除傳、注，掃除解經路上的荊棘，直通聖經殿堂，此即姚際恆詮釋經典的主要態度。對晚出的經解的批判立場表達在姚際恆《詩經通論》對毛《傳》、鄭《箋》的蔑視態度上：

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略，今日折衷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訓詁，與《爾雅》略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已。¹²

由此可見姚氏作《通論》的基本詮釋觀點，凡是與經旨、詩旨無關的，他都取忽略、跳過的方式，不予採用。因此就算是現存最古的解釋——毛《傳》，他也不願理會，更遑論「鹵莽滅

⁷ 〈詩經通論序〉、〈詩經論旨〉，《詩經通論》，《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2冊，頁5；頁9-10。

⁸ 〈詩經通論序〉，《詩經通論》，卷前，頁5。

⁹ 姚際恆：「欲通《詩》教，無論辭義宜詳；而正旨篇題，尤爲切要；如世傳所謂《詩序》者，不得乎此，則與瞽者之俚俚何異？」〈詩經通論序〉，《詩經通論》，頁5。

¹⁰ 姚際恆著，簡啟楨輯點：《禮記通論輯本》（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上冊，頁275。

¹¹ 姚際恆著，張曉生點校：《春秋通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序〉，頁5。

¹² 〈詩經通論序〉，《詩經通論》，卷前，頁5。

裂」的鄭《箋》。他批駁毛、鄭的程度沒有像攻擊《詩序》那樣激烈，但基本上反對的態度仍然一致，而其唱反調的理由不外乎毛、鄭附會、固陋、拘泥……等。¹³或許是毛公之年代較早，加上毛《傳》注解文字較為簡潔而籠統，又較少碰觸到詩旨的解釋，因此姚際恆對毛《傳》的態度顯然比較緩和。相形之下，他對於鄭玄箋釋的抨擊就明顯地不留餘地了。在《詩經通論》中，姚氏使用不少的情緒性字眼來批評鄭《箋》，除了常見的附會、迂折、固執等評語外，他甚至說出「笨伯」、「癡叔」、「稚子塗鴉」、「欺世」、「發嘔」等今人所謂涉及人身攻擊之言，¹⁴由此可見姚氏對鄭《箋》的極度反感。

姚際恆甚至喊出「解經以後出為勝！」的口號，¹⁵從後出轉精的角度來看，這也算是進步而具有突破性的觀點，也因此我們對於下面這個問題充滿期待：連接近作品時代的前人舊說、注釋都不可信時，對於詩文中出現生難、不易解釋的字詞，姚際恆該如何得知其意？有些人可能會對結果感到失望。綜觀《詩經通論》對三百篇的解說，我們可以看出姚際恆對字詞並沒有訓詁考辨的習慣。訓解的依據則是主觀認定的詩文本意，或者從上下文意的發展脈絡而解釋，又或者根據詩旨的可能走向而落實。因此，對於字詞的解釋，毛、鄭之說，或者孔穎達以後諸家之解釋，對於姚氏而言，其參考性不高，甚至不必參考。因為詮釋字意詞義的標準不是後來的毛、鄭諸人，而是詩文本身。抑有進者，凡遭遇到一些從未見過、極為生僻的字詞，如果與詩旨大意無關，他便輕易瀟灑地用「未詳」或「不必詳求」等語交代過去，還說只取其大意便可。當然就姚際恆來說，字詞訓詁的基本解釋並不重要，他主張解《詩》要以掌握詩旨大意為先，這是方法上的第一義。既然如此，各種生難字詞或名物制度之意義在他看來都是次要的，不必過於泥求。¹⁶

¹³ 《詩經通論》對於毛《傳》的指責以「附會」較多，如說〈周南·關雎〉的「雎鳩」摯而有別之性（卷1，頁19）。〈麟之趾〉的訓「振振」為仁厚之義（卷1，頁30）。〈召南·鵲巢〉的「鵲巢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卷2，頁31）。至於拘泥的解說，如〈邶風·燕燕〉的「頡之頡之」（卷3，頁45）。說毛《傳》固陋的，如〈大雅·韓奕〉首二句之解釋（卷15，頁209）。

¹⁴ 姚際恆《詩經通論》多次批評鄭玄的解釋「附會」，如說鄭氏解〈周南·關雎〉的「左右」字（卷1，頁19）、說〈召南·鵲巢〉的「均壹之德」為附會（卷2，頁31）。又言〈采芣〉之解附會《周禮》、《儀禮》以解釋《詩》文（卷2，頁32）。又有言其「迂折」者，如〈周南·漢廣〉的「翹翹錯薪」（卷1，頁28）、解〈邶風·柏舟〉「日居月諸」二句（卷3，頁43）。又有說其「固執」者，如〈小雅·天保〉（卷8，頁125）、〈小雅·采芣〉（卷12，頁168-169）。「笨伯」、「癡叔」之譏見〈幽風·七月〉（卷8，頁113）。「稚子塗鴉」之評見〈周頌·噫嘻〉（卷16，頁224）。詬其「欺世」之說見〈周頌·噫嘻〉（卷16，頁223）。又「發嘔」之說見〈幽風·東山〉（卷8，頁117）。

¹⁵ 《詩經通論》，卷5，頁75。

¹⁶ 姚際恆《詩經通論》對於詩文中一些無法明確得知其意義的字詞，當他不相信毛、鄭之說，自己又無法詮釋其真正意涵時，他便用「未詳」、「不必詳求」等詞語帶過，如論〈召南·采芣〉之「僮僮」、〈邶風·柏舟〉之「不可選」之「選」、〈鄭風·清人〉「清人在彭」「清人在消」之「消」「彭」、「大雅·大明」「倪天之妹」之「倪」字等。分見卷2，頁33；卷3，頁43；卷5，頁77；卷13，頁178。至於說只取大意不必細論字詞之意的，如論〈幽風·九罭〉之「九罭」、「袞衣繡裳」、「遵渚」、「遵陸」；〈狼跋〉之「狼跋其胡」等解釋，姚際恆：「前詩只如朱子，取其大意便可

（二）崔述的《詩經》學著作

崔述是支偉成心目中的「清代南北懷疑派兩大家」之一，¹⁷ 其考辨著作至今視之仍有相當的價值。他在年少讀書的過程中對古書產生過許多的懷疑，由此而養成他勇於懷疑、勤於考辨的精神，這也是他一生治學的重要信念。¹⁸ 崔述在《詩經》學史上的力作是《讀風偶識》四卷，本書的書名其實已經描述出崔述寫作的基本風格。「偶識」比較像讀書有所得，偶然間有所領悟而記下，是一種帶有文人情趣的心得雜記之書，並無建立完整體系的企圖。不過，書名取得輕鬆寫意，作者的批評砲火卻很驚人，本著考信的態度，懷疑的精神，崔述利用史實、邏輯與經驗法則針對《序》的罅漏展開了猛烈的抨擊。

在〈通論詩序〉裡，崔述總論《詩序》的各種缺失包括：《詩序》為東漢衛宏所作，非子夏作，亦非孔子或國史所作；《詩序》無分大小，且出於一人之手（衛宏）；《詩序》較三家而言，雖有許多新說，但《毛詩》晚出，這些新穎的解釋有許多是附會之說，因此成績不如三家；《詩序》喜歡強不知以為知，所謂諷刺之言多為鍛鍊之說、附會《左傳》……等等。¹⁹ 這些文字幾乎可以說全面地碰觸到了《詩序》的疑點與弱點。

崔述駁斥《詩序》最主要的依據在於以常理與事理衡斷，也包括了歷史上曾發生的「實事」。如崔述以為〈齊風·還〉、〈著〉、〈東方之日〉等《序》說，不合常情。²⁰ 〈魏風·葛屨〉、〈汾沮洳〉「刺儉」之說非但不合常情，更不合事理。²¹ 又在〈通論十三國風〉中，崔述對《詩序》作一總論，針對其在十二〈風〉（不含二〈南〉及〈豳風〉）中確鑿無疑地說美某公、刺某公之類的内容提出疑問，包括何以獨獨〈魏風〉、〈檜風〉沒有直指刺或美某君？此二國在齊、陳二國後二百餘年才滅國，「何以遠者知之歷歷，而近者反不之知乎？」²² 論〈鄭風·叔于田〉二篇，崔述以詩文為證，一一地挑出《序》說不合理之處，並且得出《詩序》好附會之結論。²³ 直接以史籍驗證《序》說之謬的解說，在《讀風偶識》出現較多，²⁴ 這可以算是

，後詩則不能詳求，亦不必詳求」。分見卷8，頁119-120。

¹⁷ 另一為姚際恆。見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目次〉，頁5。

¹⁸ 崔述曾云：「余少年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崔東壁遺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16。又說：「余年十三，初讀《尚書》，亦但沿舊說，不覺其有異也。讀之數年，始覺〈禹謨〉〈湯誥〉等篇文義平淺，殊與三十三篇不類；然猶未敢遽疑之也。又數年，漸覺其意理亦多刺謬。又數年，復覺其事實亦多與他經傳不符。」《崔東壁遺書》，頁582。

¹⁹ 《讀風偶識》（臺北：學海出版社，1992年），頁1-11。

²⁰ 《讀風偶識》，卷3，頁24-25。

²¹ 《讀風偶識》，卷3，頁26。

²² 《讀風偶識》，卷2，頁17-19。

²³ 《讀風偶識》，卷3，頁11-14。

²⁴ 崔述《讀風偶識》說〈邶風·綠衣〉、〈日月〉及〈衛風·碩人·序〉之《序》文皆是誤解《左傳》（卷2，頁20；卷2，頁33）。〈擊鼓〉云「平陳與宋」與《左傳》經文不合（卷2，頁24）〈式微〉、〈旄邱〉說黎侯之事，與史傳不合（卷2，頁25-26）。〈新臺〉、〈二子乘舟〉說衛宣公與伋、壽二子之事，與《左傳》記載不符（卷2，頁26-28）。〈衛風·河廣〉宋襄公思母之說以《左傳》之記載駁之（卷2，頁35）。〈王風·揚之水〉刺平王遠屯戍于母加之說，與當時時勢不符（卷3

崔述治《詩》的重要方法。

至於對毛《傳》、鄭《箋》的態度，崔述仍以附會或不合事理之說予以指責，²⁵ 或者攻擊其曲從《序》說。²⁶ 他批判毛、鄭之失，主要的根據基準還是在於經文本身，他從經文出發，再用理性的、冷靜的態度，以是否合於事理常情來審視漢人的解釋，因此常能指出毛、鄭之說有違背經旨之處。對於毛、鄭之說造成的影響，他感嘆後人「寧叛聖人之經而不肯少異於漢儒之傳，寧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說」，²⁷ 也遺憾毛、鄭之學使《詩經》成為章句之學、舉業之用而忽略了聖人教化之意。²⁸ 種種跡象顯示，崔述反對《詩經》的傳統傳注，主要的理由是他認為其中許多解釋掩蓋了聖人原意，無法彰顯倫理教化的真正價值所在。

崔述對於三百篇的名物訓詁之說興趣不大，對於詩文中瑣碎繁雜的細部字詞、名物制度更是擺落不提。「偶識」的重心仍在詩旨精神「見識」，而非單詞句意的零碎「知識」。就以書中解釋單詞單意最多的〈豳風·七月〉、〈東山〉二詩為例，雖然解說的方式依循傳統，分章而釋意，每章之下概述大意，並詳解各章中生難字詞，但其基本訓詁仍太過粗略，多處皆直接跳過毛、鄭解釋，直接告訴讀者他認為的可能解釋，至於這些解釋如何得來？其訓詁的過程為何？對崔述而言顯然都不是重點，《讀風偶識》在這一部分的表現肯定會讓許多研《詩》學者失望。不過，崔述之所以忽視訓詁名物自有他的理由，他本來就認為「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²⁹ 如果不用考究訓詁名物（尤其是名物之學）即可明白聖人之道，那當然不需要把讀《詩》的精神擺在這裡。

（三）方玉潤的《詩經》學著作

方玉潤解《詩》很能注意到民間歌謠的特徵，他的《詩經原始》能倍獲好評，原因之一是這方面的表現。《詩經原始》以「偽託」、「附會」之詞來形容《詩序》，並且強調涵泳全文、尋繹詩意的解詩方式，也就因為如此，他在說解詩意時可以不顧《序》說而直探詩人之旨。不過，在實際的解釋過程中，與姚際恆、崔述不同的是，方玉潤仍有不少地方為《詩序》開脫，或是間接的肯定其說，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取舍標準乃在於是否符合「詩教」，符合所謂的聖人之意。³⁰

，頁3-4）。說〈王風·中谷有蓷〉、〈兔爰〉、〈葛藟〉等篇東周後事，與史事不符（卷3，頁6-7）。〈鄭風·山有扶蘇〉以下三篇，《序》皆以為刺鄭昭公，但以《春秋》經傳而論，未見所譏刺之事實（卷3，頁18-19）。

²⁵ 《讀風偶識》，卷1，頁15。

²⁶ 《讀風偶識》，卷3，頁17。

²⁷ 《讀風偶識》，卷2，頁14。

²⁸ 《讀風偶識》，卷3，頁30。

²⁹ 崔述：〈考信錄提要下〉，《考信錄》（臺北：世界書局，1979年），頁4。

³⁰ 方玉潤以〈陳風·衡門〉為賢者甘貧而無求於外之詩，「〈陳〉之有〈衡門〉也，亦猶〈衛〉之有〈考槃〉、〈秦〉之有〈蒹葭〉，是皆從舉世不為之中，而已獨為之，可謂中流砥柱，挽狂瀾於既倒，有關世道人心之作矣。」但《序》卻說是：「誘僂公也。」不識聖人刪存之意，實可嘆也。見《詩經原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卷7，頁622-623。

當方氏認為《序》說合理時，他不會刻意視而不見，反而會持平地接受、肯定其說，但大致而言，他對於《詩序》的接受只是局部性的，例如以為部分《詩序》之言可能說出了本詩的言外之意，只是詩人本義不在「美」，而是在「諷」；³¹ 又如說〈鄭風·野有蔓草〉的「首序」可信，「續序」則非。³² 他對於《序》說的取捨標準是，「《序》之解經往往得其大概，而措辭又非，故詩旨反因之而晦，須為細審乃知其得失也」，³³ 也因此，他評論〈小雅·隰桑〉、〈大雅·蕩〉之《序》文，以為或有偽謬之處，但都符合詩的言外之意，故仍有可取之處。³⁴ 另外，方玉潤有時也從尊古的角度，對於《序》說採用暫時接受的策略。如〈大雅·洞酌·序〉以詩為「召康公戒成王」之作，方氏云：「未知其何所據，然相傳既久，亦姑從之」。³⁵ 當然，這些肯定、贊同《序》說的例子畢竟只佔少數，方玉潤對於《詩序》的基本立場還是反對的，只是沒有像姚際恆、崔述這般激烈而已。³⁶

不過，方氏的說《詩》在三人中自有其特殊性的意涵，從反權威的角度而言，方玉潤因為受到姚際恆的啟發而反《序》，理論上姚氏之說在方氏的心目中應該頗具權威性。不過，姚氏對方氏的影響並不在於詩旨的意見，而是勘查詩旨的方法。亦即，方氏對姚氏的肯定及接受，源自於一種解《詩》方法上的獨立自由，而不是在實質內容上讓方氏徹底信服。因此，面對姚氏之說，方氏將之與《詩序》、《朱傳》放在同一平台上仔細檢視，因為那些都是前人之見，是則取之，非則駁之，無須盲從。因此，《詩經原始》中出現不少姚氏之說不如《詩序》、《朱傳》的評論，由此可證方玉潤面對古今不同的詩旨解說並無「舊不如新」的陳見。甚至，那些曾經用來批評《詩序》、《朱傳》之說的用語，方氏也轉移到姚氏身上，不唯如此，方氏還發明了「高叟」、「夢中說夢」、「千秋笑柄」、「腐儒之見」等激烈的譏刺之語來詆斥姚際恆，³⁷ 可見姚氏在方氏心中完全不能構成漢宋之後的新權威，所以我們必須說，方玉潤受姚氏的影響就僅在說詩的方式層面上，一種獨立的「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惟其是者從而非者正」的詮釋態度，³⁸ 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態度，而讓評論者以為方玉潤的成就又在姚際恆之上。³⁹

³¹ 《詩經原始》，卷4，頁415-417。

³² 《詩經原始》，卷5，頁496-497。

³³ 《詩經原始》，卷7，頁629。

³⁴ 《詩經原始》，卷12，頁999；卷14，頁1142。

³⁵ 《詩經原始》，卷14，頁1112。

³⁶ 當方玉潤不滿某些《詩序》之說不合聖人「《詩》教」時，他也會使用一些情緒性的字眼，如譏評《序》說為「小兒囁語」、如「夢囈」等，分見《詩經原始》，卷5，頁433；卷15，頁1199。。不過這些口氣強烈的用詞畢竟少見，不像姚際恆那般，似乎以痛斥《詩序》為己任。

³⁷ 「高叟」、「夢中說夢」等用語，分見《詩經原始》卷2，頁233；卷6，頁559；卷7，頁625；卷15，頁1186。

³⁸ 〈自序〉，《詩經原始》，頁6。按：從「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之語，我們要說方玉潤視姚際恆為新權威亦未嘗不可，不過，如同漢宋舊說，這樣的權威是必須推倒的權威。

³⁹ 鄭振鐸評介《詩經原始》：「此書極重要，多採姚際恆之說，而見解較他更好，新的意見也極多。」

方玉潤曾經自言反對考據式的解《詩》方法，他認為即使有深厚學養的通儒顧炎武（1613-1682），也因為囿於考據的眼光而無法「四面旁觀」，因而導致其說不可信。⁴⁰ 由此可知清代重視考據的徵實學風並沒有影響到方氏，反而激起他的某種反感。既然反對考據的解《詩》方法，方氏自然在訓詁的方面刻意採取一種較為輕忽的態度，對於毛、鄭之說凡是與詩旨無關的，便跳過不談。因此在《詩經原始》的正文中，極少出現毛、鄭之說。甚且即使是放在每一首詩後的「集釋」（專門用來解說詩文裡生難的字詞），毛、鄭二家出現的次數仍然相當有限。以二〈南〉為例，在「集釋」的部分，方玉潤最常引用的竟然是朱子《集傳》，其次才是孔穎達（574-648）《正義》之說，第三則是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與姚際恆的《詩經通論》。毛公之說只引用四次，鄭玄之說則全無。若以時代而論，宋人佔最多。⁴¹ 這大概可以說明方氏面對訓詁的態度與宋人相近，只求一種通用的解釋，不必像清代漢學家般字字追究、考證，從字形、聲韻或假借等途徑去確定其字義。他之所以偏好引用朱子之說，其原因應該就在這裡。

三、《詩經》學史對姚際恆等人的評價

姚際恆、崔述、方玉潤三人的學術活動年代全不相及，並沒有重疊的部分。由姚際恆至崔述乃至方玉潤，歷經順治（1644-1661）至光緒（1875-1908）。因此三人幾乎跨越整個清朝。

迄今我們仍然不能確認姚氏等三人各自的師承關係。這三人的交遊不廣，學術上的交往幾乎闕如。不過，姚際恆雖然師承不明，⁴² 但學問還是淵博的，因此毛奇齡（1623-1716）曾經邀請他與閻若璩（1636-1704）一同討論《古文尚書》的問題。⁴³ 除此之外，也找不出其他姚際恆參加學術聚會或交遊情形的資料。崔述雖然身處乾嘉漢學最隆盛之期，卻獨學而無友。他僅在早年見過孔廣森（1752-1786），但卻在他死後才讀到他的書，也不知他當時已死。晚年曾同漢學家戚學標（1742-1825）通過信。除了交遊不廣，加上他身處北方，地理環境的影

《中國文學研究新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5年），頁37。

⁴⁰ 〈詩旨〉，《詩經原始》，頁153。

⁴¹ 二〈南〉中「集釋」部分引用朱子之說共計30次，其次為孔穎達14次。陸璣與姚際恆之說共引用11次，第四為陸德明5次。第五毛公之說與嚴粲相同，皆為4次。就時代而論，方氏引用著作，漢代的著作共四種：毛《傳》、《爾雅》、《韓詩》、《說文》。三國一種：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唐代三種：孔穎達《正義》、陸德明《釋文》、施士丐《詩說》。至於宋人著作除朱熹《詩集傳》之外，尚有：李樗《毛詩集解》、王安石《詩經新義》、嚴粲《詩緝》、項安世《項氏家說》、王質《詩總聞》、輔廣《詩童子問》、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邢昺《爾雅疏》與李如圭《儀禮釋宮》等。

⁴² 關於姚際恆的師友之考察，見日人村山吉廣撰，林慶彰譯：〈姚際恆的學問（中）——他的生涯和學風〉，收入林慶彰、蔣秋華編：《姚際恆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年），上冊，頁39-56。

⁴³ 事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卷8，日人村山吉廣對此有較詳的敘述，見村山吉廣撰，林慶彰譯：〈姚際恆的學問（中）——他的生涯和學風〉，《姚際恆研究論集》，上冊，頁53-55。

響，造成他在學術上的孤陋寡聞。他的著述得以見世，全賴其弟子陳履和刊刻，否則無人得見。⁴⁴ 至於方玉潤，更是生活在雲南僻處，與中原相隔千里，直至四十五歲之前仍未離開過雲南。當時的方玉潤聲名無聞，交遊亦狹，可謂遠離學術圈之邊陲學者。⁴⁵

以清代經學的發展而言，師友之間的傳承、砥礪、影響極為重要，甚至形成許多學術團體，左右了學術發展的走向。但是這三人在學術交流方面甚少，幾乎可以說處於孤立狀態，其於《詩經》學上的學術影響力方面，在清朝幾乎可以說是相當微小。

但是梁啟超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整理清代《詩經》學的研究成果，於正統派之外舉出姚際恆《詩經通論》、崔述《讀風偶識》以及方玉潤《詩經原始》三書，以為此不同於傳統學者之固守毛《序》、毛《傳》，而能獨抒己見，另闢蹊徑，並云：

清學正統派，打著「尊漢」「好古」的旗號，所以多數著名學者，大率群守《毛序》，然而舉叛旗的人也不少。最兇的便是姚立方著有《詩經通論》，次則崔東壁著有《讀風偶識》，次則方鴻藻著有《詩經原始》。這三部書並不為清代學者所重，近來纔漸漸有人鼓吹起來。據我們看，《詩序》問題早晚總須出於革命的解決，這三部書的價值，只怕會一天比一天漲高罷。⁴⁶

自梁啟超之後，姚際恆、崔述、方玉潤在《詩經》學史上逐漸被定位為清代能獨立治學，具有懷疑精神，能跳脫舊有注疏桎梏的研究者。⁴⁷

四、典範的塑造

在學術史上，觀念的創新與方法的建設都是引人矚目的論題。許多學者之所以能留名於學術殿堂，未必是因學詣深邃，高出儕輩，而是其學術成就是否能在既有的成績上邁進，甚至開創新局。學術史撰寫者的工作便在於梳理過去積累的學術成績，並且進行評介。學術史

⁴⁴ 崔述讀到孔廣森的《大戴記補註序錄》時說：「余昔會試時，曾與檢討（孔廣森）相識，年甚少也。數十年不見，不意其學刻苦如是。」但此時孔廣森早已過世。《崔東壁遺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408。崔述曾自云：「若述者，其學固無可取，而亦絕無人相問難者；……讀書雖有所得，而環顧四壁，茫然無可語者。」〈與董公常書〉，《崔東壁遺書·無聞集》卷3，頁3。又說：「嘗冀有一二同志，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而居僻寡交游，所見學者多專攻舉業。間有好古之士，祇肆力於詩賦博覽，意不能有所遇，而余亦漸老矣。」〈贈陳履和序〉，《考信附錄》，卷1，頁33-34，收入崔述：《考信錄》（臺北：世界書局，1979年），下冊。

⁴⁵ 有關方玉潤的生平資料，以近人楊鴻烈〈方玉潤先生年譜〉所述最詳。收入《中國文學雜論》（上海：亞東圖書館，1928年），頁71-93。

⁴⁶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頁206。

⁴⁷ 後來學者或以「懷疑派」、「超然派」、「獨立派」稱呼此三本著作。陳柱稱姚際恆為「懷疑派」，〈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林慶彰、蔣秋華編：《姚際恆研究論集》，中冊，頁345。何定生則稱姚際恆為「各派混戰中的超然的一派」，〈關於詩經通論〉，《姚際恆研究論集》，中冊，頁363。夏傳才通論清代《詩經》研究的學術時，以「超出各派鬥爭的獨立思考派」之語統稱姚、崔、方三人，並謂：「到近代，人們才發現他們的價值。」《詩經研究史概要》，頁228。

的撰寫脫離不了「典範」的選擇問題，對於某些里程碑式的研究成績而言，這種選擇毫不困難，可以輕易取得較為普遍的共識。尤其在科學史的撰寫部分，「典範」的選擇有較為客觀的標準進行衡量，因此在「典範」的地位確定上，較易取得普遍性且具歷時性的共識。但是「典範」的選擇在人文學科上，就會遭遇較大的困難。其中較為關鍵的因素是人文學科的知識系統較不容易被完全推翻，它具有較強烈的連續性。另外在方法與觀念的建立與創新上並不具有標準一致的檢證過程，況且這些新觀念與方法的建立往往無法獲得普遍性的支持或使用。

然而人文科學術史的撰寫者對於「典範」選擇與描述仍是興致盎然，在學術史中，仍可以看到許多具有「典範」意義的學者或是學術風潮。其中有些是理所當然可稱為典範的學術成績，但是無可諱言的是有某些「典範」是被「塑造」出來的。「典範的塑造」並非負面的詞語，只是在人文學科中，某些「典範」的價值是隨著學術思潮的變動或是外在因素的介入而被標舉樹立。也就是說理想的狀況下，學術史描述的「典範」，應該是該學術人物或學術成就就在當時，或是在後來某個時期開始發生重大而廣泛的影響，並且形成某種思潮或是受到普遍性的認同。但是某些時候，學術史的撰寫者選取「典範」並沒有考慮到「影響」的問題，而是強烈地加上自身的時代外緣因素，進行對「典範」的描述或詮釋。

就《詩經》學史來觀察，姚際恆、崔述、方玉潤代表的是一種特別樣式的典範成形，他們的著作長期湮沒無聞，整體學術表現在清代中也談不上拔類超群。然而當時代思潮一起，學術史的撰寫者因其部分說法或解釋與新思潮不謀而合，而用力加以標舉，引以為先驅，並且大加讚譽。這樣的典範塑造，主要還是跟學術史撰寫者的時代背景或自身的喜好有關。

《詩經通論》、《讀風偶識》與《詩經原始》的作者在整體學術史上的地位並不算太高，我們可以稱他們為次級學者，但純就《詩經》學史而言，三書的知名度極高，三位作者絕對是大家。《詩經通論》等三書之性質屬於解經之作，但是作為後人研究的對象而言，它們都屬於文本的範疇，而研究者則相應的屬於讀者、接受者的身份。三書在當時代名聲不響，絕非名山之作，到了民國初年之後廣受注目，不僅擠進了《詩經》學史，還成為別具特色的名著。學者為了定位三書的性質與價值，紛紛以各種名目稱之，除了獨立、超然之外，還有以文學說《詩》、還《詩經》本來面目等諸多說法。這些評語映現了研究者的歷史處境，即讀者的期望視界（horizon of expectations）。當讀者（研究者）紛然以反傳統、以文學的視角解《詩》等理解前見去期望作品、閱讀作品時，則具有這些特質的作品，自然雀屏中選，被讀者相中，加以提升、發揚之。

以民初時期的學術背景而言，《詩經》的議題，在與「整理國故」相關的理論和實踐中，不斷地被援引為範例，而《古史辨》的經書辨偽工作，也導因於輯錄《詩辨妄》。⁴⁸ 從學術史

⁴⁸ 《古史辨》的成書緣於顧頡剛（1893-1980）對於鄭樵《詩辨妄》的輯集，見顧氏〈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等編著：《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1987年），第1冊，頁46-49。

的角度來分析，「整理國故」運動中，《詩經》和其他經書的「典律」(canon)光環逐一被拔除，⁴⁹ 人們開始對傳統經典進行史料化的工作，在這種學術背景與風氣之下，清代具有懷疑精神與有辨偽考信之作的學者，獲得民初學界的青睞，可謂是順理成章的事。⁵⁰

在民初新文化運動的特殊背景之下，貶低《詩序》的價值已成學者的共識。他們一面表示要救《詩經》於漢宋腐儒之手、歸還《詩經》之文學真相，⁵¹ 一面又透過更加精密的辨偽方法，以摧毀流傳流行久遠的《詩序》。⁵² 清代姚際恆、崔述、方玉潤著作中所突顯出的重史精神，與民初整理國故之風潮恰好相近；三人涵泳詩文，用史學考古的立場對傳統舊說進行嚴格的檢驗，⁵³ 這種求實的態度與方法，與民初學者尙疑崇證的治學精神若合符節。因此，在這波辨偽去《序》、疑故考信的風氣下，姚際恆《詩經通論》自然被賦予典範的作用，而和姚書同具反傳統特質的崔述、方玉潤二人《詩》學著作，連帶也受到矚目，身價跟著水漲船高，終於造就了《詩經》學史上的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只是，他們可能沒注意到（更可能的原因是刻意忽視）姚際恆等人雖不滿意《詩序》與傳統傳箋的細部說解，卻也未曾懷

⁴⁹ 以《詩經》而言，胡適（1891-1962）就告訴大家：「從前的人，把這部《詩經》都看得非常神聖，多說它是一部經典，我們現在要打破這個觀念；假如這個觀念不能打破，《詩經》簡直可以不研究了。因為《詩經》並不是一部聖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的經典。」〈談談詩經〉，《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71年），第4集，頁557。

⁵⁰ 如梁啟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以閻若璩、胡渭、萬斯同、姚際恆、惠棟五人為清初辨偽學的代表，又在乾隆時期的辨偽學中提及崔述的《考信錄》，說：「他那種處處懷疑，是是求真的精神，發人神智，時在不少。」《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臺北：中華書局，1982年），頁37。支偉成云：「姚氏《古今偽書考》，尚係單詞片義。獨東壁之《考信錄》，貫穴群經，卓焉能自樹立。」《清代大師列傳》（湖南：岳麓書社，1998年），頁157。胡適曾說：「崔學的永久價值全在他的『考信』態度。」見《崔東壁遺書》，第1冊，〈胡序〉，頁5。

⁵¹ 胡適：「《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誰也知道，它是世界最古的有價值的文學的一部，這是全世界公認的。」〈談談詩經〉，《胡適文存》，第4集，頁556。胡適又認為《詩經》的研究者在解題方面要「大膽地推翻二千年來積下來的附會的見解；完全用社會學的、歷史的、文學的眼光從新給每一首詩下個解釋」，「關於一首詩的用意，要大膽地推翻前人的附會，自己有一種新的見解。」〈談談詩經〉，《胡適文存》，第4集，頁559-560。其餘相關訊息可參錢玄同：〈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古史辨》，第1冊，頁50；鄭振鐸：〈讀毛詩序〉，《古史辨》，第3冊，頁384-385。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古史辨》，第3冊，頁309。

⁵² 按：讚賞姚、崔、方三人的顧頡剛、鄭振鐸都發表過反《序》言論。顧頡剛以為《詩序》是「有組織的曲解，所以能騙住許多人，使他們相信《詩序》的說話即是孔子刪詩的本義。」〈重刻詩疑序〉，《古史辨》，第3冊，頁387。鄭振鐸也曾詳細地論證《詩序》之缺失，並說：「《毛詩序》是沒有根據的，是後漢的人雜采經傳，以附會詩文的；與明豐坊之偽作《子貢詩傳》，以己意釋詩是一樣的。」〈讀毛詩序〉，《古史辨》，第3冊，頁396、400-401。

⁵³ 姚、崔、方三人都慣用考古的方式，以《左傳》、《史記》等可信之史書為依據，針對《詩序》與毛、鄭之說加以甄別，直指其附會穿鑿等缺失。姚氏之說見《詩經通論》，卷3，頁46-47；頁49；頁55；卷4，頁56；頁65；卷5，頁73；頁77；頁81；卷6，頁89；卷7，頁109；卷9，頁129-130。崔述之說見《讀風偶識》，卷2，頁20-24；25-26；33；35；卷3，頁4；6-7；19。方玉潤之說見《詩經原始》卷4，頁349；卷5，頁432；卷10，頁831。

疑過三百篇的經典價值。⁵⁴

就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例子來看，我們發現，有些人會在後世因為某種思潮的興盛，而被選擇為先驅型的代表人物，並給予積極而正面的肯定。然而我們要質疑的是：這種讚美的聲音是遲來的正義，還是這些人是被相中來推廣新思潮、強化新思潮之正當性的標的？典範的創立者在學術上的表現可以僅是來自其特質之鮮明？或者必須有理論與方法系統的建立？當學者以勇於懷疑、拋棄傳統、以多種角度解經的理由，來為姚際恆、崔述、方玉潤披上光榮的勳章之時，這種闡釋角度究竟是來自思潮的影響？還是三人自身學術成就煥發的啓示？

五、結語

學術史研究人的思想與學術，它本身是一門歷史，根據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的說法，歷史是人的存有之變遷發展，這種發展並不是事件因果相續的單純歷史，而是人對自身的闡發之發展，其中可能存在各種不同的結構。⁵⁵

學術史畢竟是人寫出來的，不過，我們更要強調的是：學術史不是一個人寫得出來的！理解終究會帶有一些主觀的成分，這是無法避免的行為，不過，有些學者的學術成績必須等到很多年之後，才逐漸地受到肯定，這種延後被發掘的現象之起因當然有其複雜性，但有時卻也是後人集體意識塑造出來的結果。以本文為例，學者對於姚際恆等三人會在後世某一固定的思潮、運動之下同時被加冠，這些不僅說明了人在理解時很難避免主觀行為之事實，也說明了這樣的選擇有時僅是出之於私見。

《四庫全書》著錄了姚際恆的《庸言錄》，《提要》簡介此書時，順道對於姚際恆的學風曾作出這樣的批評：「是編乃其隨筆劄記，或立標題，或不立標題，蓋猶草創未竟之本。際恆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緒論。其說經也，如闢圖書之偽則本之黃宗羲，闢《古文尚書》之偽則本之閻若璩，闢《周禮》之偽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為書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陽修、趙汝楨之說，以《周易·十翼》為偽書，則尤橫矣。其論學也，謂『周、張、程、朱皆出於禪』，亦本同時顏元之論；至謂『程、朱之學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則益悍矣。他如詆楊漣、左光斗為深文居功，則《三朝要典》之說也。謂『曾銑為無故啓邊釁』，則嚴嵩之說也。謂『明世宗當考興獻』，則張桂之說也。亦可謂好為異論

⁵⁴ 按：《古史辨》的作者群當然不可能不注意到姚際恆等三人在守舊部分的特色，例如鄭振鐸就曾說：「……方玉潤，我們也覺得他有很多新闢的見解，然而他的書也不大純粹，許多遺傳的舊說還緊緊的黏附在上面。」〈關於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中國文學研究新編》，頁24。不過，對他們而言，這個特色顯然不需過於強調。

⁵⁵ 傅佩榮：《西方哲學》（臺北：業強出版社，1989年），頁85。

者矣。」⁵⁶ 這樣的評論照理該有實質的根據，是否有失公允，可以透過考證來解決。⁵⁷ 不過，若僅因姚際恆等人的《詩經》學中的某些特質與新思潮的訴求吻合而恭維其為有遠見的先行者；這些都是某種觀點，「我們說它是一個觀點，其實意涵著可以評定它的真假」。⁵⁸

當然，無論我們詮釋什麼樣的人事物，總是希望能夠做出「不帶偏見和預設立場」的解釋。可是，根據詮釋哲學大師海德格（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的意見，「解釋」本來就具有「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之存在，因為人存在於世界之中，在具有自我意識或反思意識之前，已經身處這個世界裡。這個世界包括了文化、傳統、習俗。人們因為有了這些文化、傳統、習俗才可能進行理解。⁵⁹ 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始終認為，理解所實現的乃是主體在自己的語言系統對對象的重新構建，他承襲了海德格的觀念，強調歷史性在理解的過程中之重要。人們總是活在歷史之中，總是隸屬於歷史。⁶⁰ 於是，歷史性與傳統都成了理解的起點，成了無法拋棄的前理解。所以加達默爾始終在為成見、權威和傳統爭取應有的合法性與正面之意義。詮釋學表達「成見」的正向意涵及其存在的不可去除性。「成見」必須「理解」，「前理解」必須被深刻地剖析。面對學術史的撰寫或是對某位前輩學者的研究，「成見」將會影響書寫，這點不必也不能苛責。⁶¹ 最重要的是，閱讀者必須更小心地理解這些具有「成見」的書寫，⁶² 這樣獲取的認識也許可以更為全面也更加真實。

⁵⁶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第5冊，頁2583。

⁵⁷ 日人村山吉廣對《四庫提要》的評論表示「有點不能信賴」，但並未透過翔實的比對以駁之。詳村山吉廣撰，林慶彰譯：〈姚際恆論〉，《姚際恆研究論集》，上冊，頁86。

⁵⁸ 吳有能：「不要混同方法與觀點。假定我對世界有某種看法，然後再拿這個想法來解釋不同現象的話，顯然的，我的這個看法，並不是什麼方法，而是觀點。」《對比的視野——當代港臺哲學論衡》（板橋：駱駝出版社，2001年），頁2-3。

⁵⁹ 詳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熊偉校：《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頁181—188。按：海德格所使用的 Vorstruktur 一詞，或譯「前結構」，其後加達默爾所使用的 Vourteil 一詞，或譯為「前判斷」，兩者也常被總稱為「前理解」或「理解前見」。

⁶⁰ 加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上冊，頁357。

⁶¹ 洪漢鼎：「當代詮釋學的最新發展是作為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詮釋學，或者說是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這種詮釋學既不是一種理論的一般知識，又不是一種應用的技術知識，而是綜合理論與實踐雙重任務的一門人文學科，這門學科本身就包含批判和反思。」《詮釋學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頁320。

⁶² 民國以來，透過《古史辨》的廣為延引，姚際恆等人的《詩經》學快速成為典範；這種現象的發生難免有其時代思潮背景，現代學者撰寫學術史有無必要沿襲早期學者的前理解，這是值得省思的問題。